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吴琦主编

明清社会群体研究

MINGQING SHEHUI QUNTI YANJIU

吴琦主编

明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吴琦主编

明清社会群体研究

MINGQING SHEHUI QUNTI YANJIU

吴琦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社会群体研究/吴琦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004 - 7716 - 7

(群体·社会丛书)

I. 明... II. 吴... III. 阶层—社会结构—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D691.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8191 号

策划编辑 卢小生 (E-mail: georgelu@vip.sina.com)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插 页 2

印 张 21.5

印 数 1—6000 册

字 数 396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得到华中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近现代中国的经济社团、社会群体、文化交流研究”经费资助

丛书总序

从1978—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了整整三十个年头。思想的不断解放、观念的不停进步、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今日之中国与三十年前之中国几有天壤之别。变化无时不有，变化亦无处不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历史学。回首过往的三十年，中国历史学在承继前代之功与反思旧有之弊中不懈前进，其变化为学界有目共睹。一方面史学走出“家门”，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中国史学已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史学遵循自身发展的轨迹，不断演化着学术转型，寻找本土化的学术路径。其中，一个巨大的成就令人瞩目，这便是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社会史的崛起。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之兴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度复兴，此已成史学界之公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迄今，三十年的历程，中国社会史完成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过程，其成就不言而喻，伴随着社会史领域一批优秀成果的推出，一批学人迅速成长、成熟，开放的学术心态、广阔的学术视野、良好的学科素养、明确的学术目标、新颖的研究视角、多维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则使得这个领域弥漫着浓烈的对话氛围和创新意识，充满着勃勃生机。

面对史学领域的变化和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欣喜之余，静心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明晰，以下数端应是目前社会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其一，社会史秉承“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坚持写出“底层的历史”，无疑是符合这一领域学术研究主旨的，但一味地、长期地目光向下，排斥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精英层面的关注，则有可能使社会史的研究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社会史研究引入误区，犯下与传统精英史学相同性质的学术弊病，即重视一端，忽视一端，形成学术视阈中的盲点。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与

学术素养,任何群体、阶层、领域都应该是其研究的对象。

其二,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态势之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失衡现象也越来越突出。我们姑且以“优势区域”和“弱势区域”来作简单的区分。前者主要是指研究力量雄厚、主流学者云集、成果积淀深厚、资料发掘充分、视点广泛、视阈开阔、学术对话频繁的研究区域;后者与前者相比则反差甚大,门可罗雀、稀疏冷清,学术界关注不足。这种现象的存在,直接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区域对话以及社会史研究整体史目标的实现。

其三,社会史研究十分强调多学科交叉与渗透,因而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便显得特别重要,这是社会史研究“科学化”的关键所在。然而,今天的社会史研究对于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仍是有限而不足的,多数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基本没有体现出作者的学科素养,对某些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仅仅是停留在表层,如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方法的运用,只在于收集资料,体验与观察则完全忽略。

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明清社会史的研究,围绕博士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规划选题,潜心布局,以团队的形式共同致力于社会群体与地方社会力量的研究,已具备了很好的研究基础,并围绕这一主题,完成了一系列相关课题的研究,同时后续的纵深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这个团队的学人已分布在各地各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立志长期围绕“群体·社会”这一大的主题展开不断的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试图对于上述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诸端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索。比如,在研究对象的区域选择上,尽量加强对于“弱势区域”的关注;在研究对象的群体选择上,尽量关照各类群体,尤其是学术界关注有所不足的群体。

这套丛书分为两大系列。一是群体研究系列。丛书中所确立的群体研究对象,当为广义的社会群体,群体特征大体为具有身份一致感和共同利益的人群,且以研究的问题为中心,将群体设定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既包括社会上层,也包括社会下层,同时,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诸如皇帝、阁臣、言官、翰林、地方士人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皆为丛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明清社会群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则是各群体研究重点探讨的问题。二是地方社会研究。我们力图打破传统史学追求宏大叙事风格的研究路径,通过对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明清社会的理解。选题将涵盖地方社会秩序、地方公共事务、地方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揭示明清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关注国家、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法令、行为举措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地方各领域与社会变动的关系,前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关联问题,其中,不少问题的考察将与

整个中国近代社会联系起来。

丛书的主旨在于学术创新，或从新的视角、领域，或以新的方法、观点，表达一种真正的学术追求。在研究方法上，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类，追求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方向，力图展现具有特色和深度的学术研究。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有着一个愿望，就是能让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结论具有更多地参与国内、国际学术对话的可能，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当然，也期望求得方家指正。

吴 琦

2008年12月

于武汉桂子山

序 言

人类生活在许多方面是以群体的方式进行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社会群体都是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并为社会运行、社会变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社会群体对于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是我们考察社会发展与变化的一个颇佳视角。

然而，在社会科学中，对于社会群体的界定，学界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根据社会学对于社会群体的一般界定，大体认为，社会群体是社会赖以运行的基本结构要素之一，它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群体泛指一切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狭义的社会群体是指由持续的、直接的交往联系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

其实，不同学科对于社会群体的理解必然存在差异，也应该存在差异。一是人类社会持续着一个漫长的发展、演进历程，其中的组织形态也在不断地发展着、演进着；二是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有着自身的研究路径和学术设定，以解决问题为要旨，形成学科自身的理解十分必要。历史学与社会学对于社会群体的理解有共性，也应当存在差异性。历史学领域中的社会群体，应该是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中，具备身份一致感，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群，群体中的成员，并非一定发生直接的交往联系，但一定生存在一个大的场景之下。比如，明代州县官群体，是以明代作为大的社会背景，其中前后各地的州县官并不相识相交，未曾发生直接的交往联系，但都具有一致的身份认同感和共同的利益诉求。

明清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會变动的频繁，新的群体格局不断形成，从朝廷到社会，围绕着日益加剧的利权纷争，各阶层、集团和群体演绎着新的分化与组合。如有明一朝，朱元璋明初的政治改革，造就了这个朝代独具特色的阁臣群体、言官群体等；明朝商品经济的翻涌，孕育

出了一批批弄潮的大小商人群体，市民阶层也具雏形；明朝取仕以科举为宗的政策，引领出了大量士人，无缘仕途的士人们滞留社会，并逐渐沉淀堆积，在地方形成了各具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士人群体，他们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动中，上演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剧目。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和变动，成为群体滋生的肥土沃壤，在这一过程之中，社会成员表现出愈来愈强的群体意识和集体归属感。

明清两代，由于社会交往和交流的扩大与频繁，群体辈出，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群体之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互动关系，群体与社会紧密关联。因此，明清时期任何一个群体都是我们考察社会变动与发展、社会内部的结构性质变化的有力视点。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史的纵深发展，社会群体的研究日益渐入佳境，社会群体越来越为史学研究所重视。不过，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尚有不足，尤其是群体研究的范围和视野需要有一个较大的拓展。社会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将学术的视线引向了传统史学鲜有关注的社会下层，使得长期以来史学发展的路径得到了极大的修正和补足，因此，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这些年来，许多无人问津的下层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皆一并成为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史学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发掘，史学研究变得更加丰满、生动、有血有肉，当然也更深入，许多社会深层的问题都得到了讨论和揭示。但这些成就取得的同时，有一个问题也必须引起我们的警觉：社会史的研究，对于下层群体和弱势群体重视的同时，是否一定要对上层群体持以忽略的态度，才能够体现社会史的学术宗旨？无疑，这是对成熟的社会史的误读，这一倾向的发展，必将把社会史引向歧途。社会史在对于历史问题的把握时，首先是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任何视点的考察，都是为了说明和论证这个整体。而社会群体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与社会都构成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因而都应是我們考察社会时不能离弃的研究对象。明清时期，上层群体无一不与社会的变动紧密关联，皇帝、朝廷百官、各级地方官员、高层士人，等等，都是根植于社会的土壤之中，围绕他们所形成的现象、事件、问题，无不透露大量的社会信息，无不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们对上述问题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理解和阐述。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心走向边缘的传统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如何重新站立？如何获得新的立意、确立新的学术意义？吸取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传统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内容，或者直接将政治史等与社会史打通，应该是可以尝试和探索的有效途径。本文集即是这一思考、探索的成果。其实，这一成果也意在补正社会史目

光一味向下的偏差。

本书收录论文 10 篇,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皇帝和朝廷要员的群体研究,对于这些研究对象,学术界长期多从制度或政治史的视角展开讨论,鲜有从群体的角度予以关照;其二,士人群体,从不同的视角力图揭示士人群体的群体特性;其三,群体互动以及群体与社会发展、时局变动的关系。虽然所选群体多为中上层,但都落实在社会的层面,观照社会整体。

《“问题皇帝”:明代皇帝的群体特性》一文,将明代诸帝视为一个类群,置于明代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审视明代皇帝的时代特性,认为明代皇帝多属于“问题皇帝”。明代“问题皇帝”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政治低能化,荒政怠政现象突出;性格极端化,个性特征两极分化;价值趋向多元,诉求极端自我;心态平民化,行为举止也表现出明显的平民化和市民化倾向。明代“问题皇帝”现象的出现,有其制度、环境及社会各方面的原因,而明代“问题皇帝”之问题,对于王朝命运、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作为》对明代 162 位阁臣的政治作为进行群体考察,认为明代阁臣群体始终与皇权政治的运作相依相伴,阁臣群体的政治核心参与作用使朱元璋以后的历代皇帝成功地避免了因相权的缺位而造成的政治混乱和不稳定。他们从事实上弥补了皇权的无力、无能或不作为,帮助明朝的皇帝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从而保证了明朝的国运能连延 276 年。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作为包括:平庶政,代王言,挽时艰,陈规谏。这些政治作为的提炼,有助于我们具象地认识阁臣群体与明朝的生存关系,阁臣群体在明代历史中的地位,并从深层揭示明代的政治运行格局。

《言官群体与明代政治格局:以言官群体与其他政治群体的互动为中心》围绕言官的概念、言官群体的基本特质以及言官群体与其他政治群体的互动关系等问题,阐述了言官群体与明代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明代的言官群体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具有典型意义,言官势力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巩固皇权,维护朝纲,纠举官邪,整肃吏治,维护明代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等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实现,是言官通过与皇帝、阁部大臣、宦官、各级地方官吏等群体的互动达到的。言官群体在明朝所起的作用前后分途。言官群体对明代政治格局的作用和影响如何,皇权起着决定性作用。明代言官群体的演化过程与明代历史的演进是一致的,言官群体的历史命运与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

《明代翰林群体的社会文化功能》针对学术界研究的不足,重点讨论明代

翰林群体的社会文化功能。明代翰林广泛参与了自上而下的多方面的文化活动,诸如明代翰林几乎承担了明代所有的考试工作,为朝廷选拔和培养人才;翰林负责对皇帝的日常教育,与皇帝之间形成了一种既是君臣又是师生的关系。同时,翰林是知识阶层中的精英,翰林群体对明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不仅致力于对古代文化典籍的创造、保存与整理,同时还以自己的学行和仕途对社会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明代翰林群体的社会文化功能,同时也渗透着这一群体的政治功能。

《晚明松江士人与地方舆论:以〈五学檄〉为实例》,将晚明松江士人置于社会背景之下,以《五学檄》为视点,讨论晚明松江士人在集体抗议、对抗地方官府的事件中,利用广布流传的社会舆论,参与地方事务。万历四十四年松江府的民抄董其昌事件,在士人群体舆论的鼓动下,由几个生员反抗地方恶绅的事件,演化成一场全府上下甚至各地群众普遍参与的民抄一案。事件揭示了晚明地方舆论的明显特征:地方舆论方式多元化;冤揭、檄、公书、公揭均以群体的名义联名发布。晚明松江士人以学校为纽带群集在一起,采用击鼓、发檄、投揭等手段,利用舆论发动整个地域社会的力量,参与地方活动,共同维护地方秩序,此种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晚明地方舆论势力的强大。

《晚明江南士人社会网络研究:以陈子龙为个案》以陈子龙为个案,揭示晚明江南士人如何构建其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的作用。通过对于陈子龙诗集的梳理,其社会关系大体分为与科举相关的师长、弟子、同年,各级官员、朋友以及婚姻关系。从陈子龙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来看,是一个以陈子龙为核心的差序性等级格局,从交往的紧密程度来看,存在着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亲疏远近之分,关系强度、交往频率和紧密程度也有所不同。社会关系网络关系到士人的前途和命运,而将社会网络资源运用于地方政务或者公共事业上,往往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对个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江南士人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以政治权力的获取为目标,并依托于社会网络资源,实现其向上的流动。

《“高士情结”与“高士图”:观察明代社会的另一种视角》。明代社会的剧变通过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处世观念鲜明地表现出来,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面对变动的社会处境,其心性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通过诸多形式表达了出来,成为我们理解明代社会变迁的重要依据。在本文的研究中,明代瓷器上的“高士图”纹饰成为重要视点。明代的“高士图”十分鲜活地展示了“高士情结”的变化,并进而揭示明代士人心性的变化。文中以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互证的方式进入明代的历史情景中,通过整理明代

士人的心性变化——即所谓“高士情结”为线索，见证明代社会的变迁。

《群体互动与制度缺陷：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漕运总督作为清代的督漕长官，地位显赫，作用突出。但是作为中央与有漕各省漕务联系的“桥”，漕运总督没能发挥应有的中介人优势，反而陷入了社会关系学上的“齐美尔连带”中，受双方规范和习惯的束缚；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仓场侍郎之间分工合作，责任连带。但这种共同利益也造成他们之间职权的重叠，总漕被不断分权；作为漕务官员体系的代表，漕督反而屡被属下控制和利用，以至于经常成为一种莫名的角色。此外，清中叶以后历任总漕素质上的缺陷，也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名不副实，地位与作用日渐下降。由此，清朝中叶以后，朝廷中出现了“总漕无用论”及“废漕督”的声音，其背后的寓意不仅表达了一些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代表的漕政的失望，同时也是对朝廷政局、整个官僚体系的批评。

《博学鸿儒群体与清初学术转换》一文认为，在明末清初王朝更迭与时代巨变中，学术的发展也开始了一个重大的转变。清初博学鸿儒科的征召，导致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博学鸿儒的形成，这个学术群体的共同特征表现在：具有清初士人的风气；深受遗民的影响，背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同处共事，具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感。这个群体在其参与的集体文化活动中，以所具有的共同心态与愿望，以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在与统治者的交流与较量中，顺应了当时学术的发展趋向，呼应了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的倡导，推动了学术风气由空疏向崇实的转变，学术内容由理学向经史考据方面的转变。他们是清初学术转变的中坚力量。

《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群体研究》。有清一代，在清廷和两湖地区地方政府、官宦学者大量刻书的影响下，刻书家风起云涌。仕宦学者以刻书为荣，有的搜访前代名著，刊行于世；有的自著或辑注、校勘、整理前人著述，并刊刻传行后世；有的嗜学好古，热心刊刻乡邦文献；有的倾心刊刻家乘谱牒，缅怀先人，光宗耀门；有的以刻书为业，希冀扬名当时，流芳后代。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争奇斗妍，精雕名刻不断涌现，其刻书群体的基本特点主要有三：家学渊源的世家望族，造就了一批私家刻书群体；官宦学者、名宿乡儒是私家刻书群体的主流；刻书家群体富于出版理想与文化追求。其文化贡献主要表现为：搜求、辑刻、保存古代典籍，传承学术文化；创作和传播优秀学术成果，促进学术文化发展；精刻细雕，改进提高刻印技术，促进出版印刷业的发展。

上述论文力图解决和回答如下问题：不同社会群体的群体特质？何以形成和构成这种特质？社会群体的职业作为和社会行为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社

会群体如何互动？社会群体与国家命运、社会变动的关系？社会群体的静态与动态的辩证关系？群体考察的学术意义？等等。研究中所选取的这些社会群体，基本属于社会上中层。在今后开展的研究中，我们将不断拓展社会群体的研究视野，在社会层面展开更多的群体性研究。不过，与这一成果同时推出的《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已经展示了我们对于该项研究的继续。

成果的编辑、整理和规范是一项十分繁杂而艰辛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吴雪梅和冯玉荣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另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卢小生编审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他的恪尽职守、扶植学术的原则和态度，保证了本成果圆满出版面世。此外，本成果的出版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朱英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达深深的谢意！

吴 琦

2008年深冬 谨识于桂子山

目 录

序言.....	1
“问题皇帝”：明代皇帝的群体特性	1
一、明代皇帝的群体特征.....	1
二、“问题皇帝”产生的原因	6
三、“问题皇帝”产生的影响	22
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作为	36
一、“平庶政”	36
二、“代王言”	57
三、挽时艰	66
四、陈规谏	72
言官群体与明代政治格局：以言官群体与其他政治 群体的互动为中心	85
一、言官的概念	85
二、言官群体的基本特质	86
三、言官群体与其他政治群体的互动	98
四、结语.....	127
明代翰林群体的社会文化功能.....	130
一、明代的翰林群体.....	130
二、明代翰林与科举考试.....	139
三、明代翰林与宫廷教习.....	146
四、储才养望与典籍的修纂整理.....	153

五、结语·····	160
晚明松江士人与地方舆论：以《五学檄》为实例·····	163
一、流动的晚明松江社会·····	163
二、《五学檄》·····	166
三、士人群体与地方舆论·····	174
晚明江南士人社会网络研究：以陈子龙为个案·····	178
一、变动中晚明江南士人·····	178
二、陈子龙的生平及其社会网络的构建·····	181
三、陈子龙的社会网络分析·····	185
四、江南士人社会网络的作用·····	197
五、结语·····	200
“高士情结”与“高士图”：观察明代社会的另一种视角·····	214
一、被禁锢的“高士情结”·····	215
二、出世的“高士情结”·····	217
三、被调和的“高士情结”·····	220
四、入世的“高士情结”·····	223
群体互动与制度缺陷：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	230
一、问题缘起·····	231
二、夹缝中陨落：总漕与中央、有漕各省的关系·····	233
三、合作与争利：总漕与总河、仓侍的关系·····	237
四、名不副实的守门人与发言人：总漕与漕务体系其他 官员的关系·····	242
五、能力与素质缺陷：嘉庆初年总漕的个案分析·····	247
六、小结·····	248
博学鸿儒群体及其学术文化活动·····	248
一、博学鸿儒群体的形成·····	248
二、博学鸿儒群体·····	256
三、博学鸿儒的主要文化活动·····	268

清代两湖地区的私家刻书群体研究·····	287
一、清代以前两湖地区的私家刻书及其刻书群体·····	287
二、清代湖北的私家刻书群体及其成就·····	292
三、清代湖南私家刻书及其刻书家群体·····	299
四、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群体特征及其文化贡献·····	321

“问题皇帝”：明代皇帝的群体特性

关于明代十六位皇帝，学术界目前的成果颇为丰富，但多集中在对单个皇帝的施政方针、治国策略、文治武功、历史作用与评价等方面进行研究，本文则将明代皇帝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

一、明代皇帝的群体特征

明代十六帝在民间拥有许多称谓，其中太祖被称为“平民天子”，宣宗被誉为“太平天子”，孝宗被誉为“中兴天子”，武宗被称为“风流天子”，英宗被称为“幼冲天子”，穆宗被称为“令主”，熹宗被称为“木匠皇帝”，思宗被称为“独夫”；此外，宣宗有“促织（蟋蟀）皇帝”的绰号，武宗则以“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自居，自号“锦堂老人”；世宗佞道斋醮，被称为“新天子圣人”、“真人帝君”，自号“天池钓叟”、“尧斋”；穆宗自号“舜斋”；神宗自号“禹斋”……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称谓背后，隐含着明代皇帝的某些共性和群体特征。与前朝皇帝相比，明代十六帝具有以下四大特征：

（一）政治低能化，荒政怠政现象突出

明代皇帝的政治素质大多不高，治国能力较弱，多表现出荒淫腐化、昏聩平庸、懦弱无能。从明仁宗开始，皇帝就十分依赖他的阁臣官员，“仁宣之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杨辅政”；英宗前期的统治建立在王振专权的基础上，皇帝事事听取王振的意见；景帝的统治也有赖于于谦、王文等大臣的支持；即使被称为“令主”，享有美誉的穆宗，对于军政要务也是一问三不知，在庙堂上拱手缄默，完全依靠大臣来运作，离开他们就寸步难行。熹宗不曾接受诗书礼仪的熏陶和治国能力方面的训练，一点也不具备担任一国之君的能力。根据《明实录》显示，明代皇帝在大臣关于军国政务方面的奏章上